



钱江学术文丛

唐宋记体散文研究

赵
燕◎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钱江学术文丛

唐宋记体散文研究



赵
燕◎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记体散文研究 / 赵燕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308-16411-5

I. ①唐… II. ①赵… III. ①古典散文—古典文学研究—中国—唐宋时期 IV. ①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3222 号

唐宋记体散文研究

赵 燕 著

责任编辑 周晶晶

责任校对 张小苹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45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411-5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bs.tmall.com>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资助
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

序

在近些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文体研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相关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也比较多,赵燕的《唐宋记体散文研究》就是其中的一种。唐宋时期,记体散文与文人生活密切相关,作品数量众多,文化蕴涵深厚,该书结合文体变革时代的审美选择及记体散文的发生、演变,从文体学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唐宋记体散文的体制形态及内在成因,对记体散文产生和演变过程中的体类形态、功能承载和意境风格作了系统深入的阐释。

对记体散文滋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及与他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作历史的描述与思考,在文体研究中有着基础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记体文在生成、演变的过程中,文体形态、功能及承载内容、情志都在发生变化,经过唐代的革新,宋代的拓展,记体散文发展出成熟的创作体式。唐宋八大家的记体散文,经历不断地辨体与破体,达到相对的成熟和稳定,成为后人揣摩和研究的典范。但以往的唐宋记体散文研究多集中于作家、作品和单个文类,只将着眼点放在文学史上成就高的名家名作上,而非从文体分类的角度对“记体散文”作整体研究。赵燕的这部著作采用点面结合的研究方式,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置于记体文的整体观照之中,以为名家在做出创新成果之前,文体必然已有一个基本形态,对这原形态记体文的关注,不仅可以进入记体文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里,清楚了解其文体观念,更能了解名家在文体创新和变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完整准确地评价其文学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

古代文体学思想除了理论的直接表述,很大程度体现在文章汇总成集时的分类思想及文人创作时的文体意识上,将其与文体发展参合研究,或可成为新的理论生长点。在探究记体文的形态特征及源流发展时,赵燕将其置于动态的视野中予以观照。如唐宋山水游记,她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山水记文而非山水游记,意在统观唐宋时期所有以“记”为名的山水文章,并寻绎山水记文在这一时段向山水游记发展与演变的路径。同时,她关注所有唐以前以及初、中唐所有记写山水的文体,在统计创作篇目的基础上,分析各山水文体的发展趋势,从文人作文意图、文体形态等方面分析众山水文体错杂共生的关系。在关

注文体形态变化的同时,结合文人生活、历史背景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在理清山水记文文体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探查元结、柳宗元等人对山水游记的探索及其在文体变革方面的贡献,合理评价其功绩。她在书中回答了以下问题:文人记写山水的目的何在?这些山水记文的文体功能是什么?在文人的创作意识中,山水记与山水诗、山水赋的区别是什么?记体文何时从记山水向记游览活动转变?

记体散文的发展与古文运动相表里,以记体散文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文体制、渊源、流变,属于唐宋时期文体发展与文学观念变革的个案研究。唐宋两次古文运动,使得古文逐渐成熟壮大,用散文文体取代了骈文语体。关于古文运动的主旨、成就及古文的内涵,学界尚存歧见与争议。通过对记体散文发展演变进程的梳理,可以具体考察古文运动之于文章创作的 actual 影响,从中了解古文家对语体、结构等散文表现手段的尝试与探索。在描述记体散文的演进过程时,赵燕注意体察古文家对散体写作手法的探索,阐述在这一进程中文体发展与文体学以及时代的审美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韩愈《画记》以文字记写画面,南宋山水游记细微写物等论述,皆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有所推进。赵燕将计量方法用于文体研究,在唐山水记与山水铭文,宋庙记、庙学记与学记的发展与相互影响的关系研究中,都合理使用了统计数据。在系统深入地探析记体之发展演变及文体内涵的过程中,通过数据统计了解记体散文各文类的创作情况,统计不同文体各时段的创作篇目,在数据比较的基础上分析文体的发展态势。

赵燕的这部著作属于记体文的专题研究,在许多方面都较前人更深入、更细心,但文体与文类的关系还值得进一步的探讨,文体形态发展的动因也有待进一步开掘。记体文研究涉及的文类比较多,除了山水游记、亭台记、书画记、学记以外,还有篇目众多的祠堂记、寺院宫观记、厅壁记等。该书的亭台记一章叙述书斋记与官署亭台记不同,与文人燕居生活密切相关,似应辟专节深入论述。在探究记体散文的文体特征及其背后的文化动因时,应当探明文体渊源脉络和体制形态,明确唐宋记体散文在文体谱序中的独特价值。该书已注意到历史上各总集、别集中记体的编写和分类,但对记体在整个文体序列中的地位关注不够,一些问题的论述尚待更广泛地收集资料,将来作进一步的思考和完善。

若干年前,赵燕考入南开大学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由广袤的新疆到渤海之滨,认真苦读了几年,随后到韩国去教书,然后又到杭州工作。她是一位有个

性的学生,遇事冷静,头脑清楚,有韧劲,是那种不用人操心、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能生活得很好的女生。她的文笔不错,很干净,透露出优雅的气质。其博士学位论文当年曾得到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如今这本著作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文风依然简洁明快,而学术蕴含则更显深厚。浙江杭州是人文底蕴丰富的地方,希望她能在学术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张毅

2016年元旦于天津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记体散文的文体独立	4
第一节 记体的传承与发展	4
一 “记”名之源流及内涵	5
二 “记”体之渊源及类别	8
第二节 记体的范围与分类	19
一 历代总集选集中的记体分类	20
二 记体的研究范围及文类	24
第三节 记体散文的形成与发展	27
一 散文概念的形成与辨析	28
二 记体散文的发展分期	32
第二章 亭台园林记	42
第一节 唐公署亭台记	42
一 游宴生活与唐公署亭台记	42
二 古文家亭台记的体式创变	52
第二节 宋亭台记	54
一 借物寓意的宋亭台记	54
二 宋亭台记的体式创新	59
三 宋亭台记的主体姿态	62
第三节 唐宋园林记	66
一 园林宴游与园林记	66
二 《草堂记》与山庄闲居	71
第三章 山水记与山水游记	76
第一节 唐山水游记	78
一 文体观念及创作情况	78

二	中唐山水记的传承与创变	88
第二节	北宋山水记文与山水游记	107
一	北宋山水记文的多样化	107
二	古文家的山水游记	122
第三节	南宋山水游记	127
一	创作群体及兴盛原因	127
二	体式特征及新变	129
三	行记与山水游记	137
第四章	书画记	139
第一节	书画著录与书画记	140
一	公私收藏与书画记	140
二	书画记的体式特征	144
第二节	唐宋文人对书画记的体式革新	148
第三节	书画记与书画题跋	154
第五章	学记	158
第一节	唐宋学记的创作概况及体式演变	158
一	学记的创作情况及兴盛原因	158
二	学记的文体渊源及文体边界	162
三	学记体式及变化	169
第二节	两宋兴学运动与学记	183
一	关注兴学运动	184
二	借学记议论兴学	187
第三节	南宋理学教育与学记	198
结 语		206
主要参考文献		209
关键词索引		217
后 记		219

导 言

近年来,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渐成趋势,吴承学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在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借鉴和启示。从古代文化的大环境中去探明文体的渊源和脉络,将一些文化意蕴丰富、文学意味相对薄弱的文体置入文体学的研究视野,比如先秦盟誓、策问与对策、唐代判文等,大大拓展了古代文体学研究的范围和方法。在目前的文体学研究中,过去长时期不受重视而实有文化内涵的一些文体开始受到关注,但创作数量众多、文化蕴涵深厚的记体散文尚缺乏深入细致的总体研究。

“记”作为一种独立的短篇散文文体,兴于唐,盛于宋,南宋是其稳定发展的时期。关于唐宋记体散文,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文体史或文体概述的研究中,约略论及记体的源流及形态特征。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其中“文章体类”一节列出杂记文,对杂记文的总体特征、文体分类及各文类的体式特征皆有所论述。褚斌杰注意到杂记一体称名广泛、内容繁杂,因而将重心放置在各文类的形态特征及创作情况的描述上。谭家健《中国文化史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在“古代文章体裁”一章中,也对杂记进行分类论述,但更为简要。对记体散文研究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是王水照先生,他在《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辟专节对记体作提纲挈领的总体论述,侧重宋人对记体的发展、改造和创新。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对散文概念的生成作了详明的辨析,并在文体研究中对宋代记体散文的发展作了总体论述。但以上有关记体的内容都仅是纲领式的描述,对这一文体尚缺乏深入具体的探究和论说。

二是个别文类的研究。整体来看,各文类研究出现严重失衡,其中文学意味比较浓厚的山水游记和亭台楼阁记吸引着许多学者的注意,其中尤以山水游记为著。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为首部山水游记研究的通论之作,对山水游记的文体要素,文体的源流、演变及分期,散文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具有较强的文体意识。梅新

林、俞樟华主编《中国游记文学史》(学林出版社,2004年)则对自魏晋以来至现代的游记文学作了史的梳理。除了专门的著作之外,尚有数量众多的论文,涉及作家个案研究、单篇文章赏析及理论研究。近年来厅壁记、书画记、学记等也逐渐有学者论及。黄炳琛《唐代官厅壁记小议》、南京师范大学马银川的硕士学位论文《唐宋题壁文学研究》对厅壁记的源流演变、内容价值、体式形态等方面皆有论述。书画记的研究集中于韩愈和苏轼,日本学者川合康三在《韩愈探究文学样式的尝试——〈画记〉分析》中,对韩愈《画记》开创的散文体式作了探究。学记的文体研究寥寥,其中刘成国《宋代学记研究》一文搭建了较为完备的研究框架。

三是对古代文人记体文创作的个案研究,如对苏轼、欧阳修、杨万里的记体文的研究。

上述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多集中于对作家、作品和个别文类的研究上,更为具体地说,是只将着眼点集中于文学史上成就高的作品,而非从文体角度对“记体散文”作整体研究。对一种文体予以整体观照,是点面结合的研究方式。在名家作出创新之前,文体必然已有一个基本形态,对这一形态的关注,可以使我们更能了解这一文体出现的历史、文化、现实原因,是为文体观念研究。而这一研究又可推进相关的文学研究,我们了解了文学名家在文体方面的创新和变革,能更全面地评价其文学成就及对文学史的贡献。

目前偶有的针对个别文类的文体研究,大多浮于表面文体特征的描述,而少文体渊源、发展原由及文体内涵的深入开掘,尤其缺乏对记体统贯各文类的文体内涵进行总体观照与把握。从目前所见的关于记体纲领式的描述中,我们略可窥见这一研究倾向背后的原由。“杂记的内容是很复杂的。广义地说,它包括了一切记事、记物之文。”(褚斌杰,1990)“古代以‘记’名篇的文章很多,有的文体分类著作通称为‘杂记’类”,“其内容几乎包罗万象”(谭家健,1988)。研究者认为杂记一体称名广泛、内容繁杂,因而在论及记体时,或将“记”之规范形态几语带过,或干脆否定记体具备统贯各体文类的文体意识和体式特征,将重心置于各文类的形态特征及创作情况的描述上。记体是一种较为松散的文体类别,似乎难以确定文体的总体特征,但若否认记体具有内在的质的规定性,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同为刻石之文,亭台为记,墓志为碑,宫室祠庙碑、寺观碑又能脱离碑文,成为记文独有的文类?为何修造记文源于史述,山水记文源于地志,都进入记文领域,综名为记?同为修造记文,为何亭台、园林、寺观记文渐成规模、蔚为大观,勘灾、浚渠、筑塘等记文篇目寥寥?为何在记文的发展过程中,有

些文类进入,有些文类退出?同为记写滕王阁,为何王勃作序,韩愈为记?

只有通过对其文体内在的本质特征的把握,我们才能确定不同文体的内外界限,才能考察其文体内部的源流正变。所谓文无常体,记体在生成、演变的过程中,文体形态、功能及承载内容、情志都在发生变化,经历反复辨体与破体,达到相对的成熟和稳定。阐述在这一进程中文体发展与文体学以及时代的审美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历时把握不同时期记体编入各文类的内在规定,当为系统深入地探析记体之发展演变及文体内涵的理想理论工具。

本书以唐宋记体散文的文体独立及其文化意蕴为主要研究内容,所谓“记体散文”,实包含着文体与语体两个方面的内容。“记”作为一种独立的短篇散文文体,兴于唐,盛于宋,南宋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散文语体经过唐宋两次古文运动,也逐渐成为记体文的普遍语言体式。之所以以唐宋为时限,一是记体于此时产生形成,通过对这一时期记体文的梳理,能更准确地把握记体散文的文体形态及特质;二是记体散文经过唐代的革新,宋代的拓展,已发展出成熟的创作体式,唐宋八大家的记体散文,成为后人揣摩精究的典范。

以记体散文为研究对象,对其文体体制、渊源、流变作历史的描述和思考,属于唐宋时期文体发展与文学观念变革的个案研究。唐宋两次古文运动,使得古文逐渐成熟壮大,用散文文体取代了骈文语体。关于古文运动的主旨、成就及古文的内涵,学界尚存歧见与争议。对记体散文的发展演变进行梳理,我们可具体看出古文运动之于文章创作的 actual 影响。散体与骈体的论争,实附着于文体的创作之上。记体文的语言形式的变化,正反映出骈体与散体此消彼长的发展形势,也可看出古文家对语体、结构等散文表现手段的尝试与探索。对一种文体的滋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及与他种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等问题作历史的描述与思考,在目前的文体研究中有着基础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但凡一种文体的产生,除受文学自身的发展推动外,还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有关。可以说,记文的兴盛,全方位地顺应了唐宋学术文化的繁荣与文人士大夫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是当时社会文化活动的产物。因此关注文体的文化内涵,即是在探究文体变革、体式形态等问题时,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发掘促进其产生变革的社会文化要素,及其中体现出人们把握客观世界的特定思维方式。本书进行记体散文的文体研究,也内含着这样一种研究视角。在探讨修造记的形成时,结合唐宋官吏考课及铨选制度,解释其纪事纪功的内容模式及文体意识。考察唐宋山水游记体式的变化,则从文人的宴游生活与游览方式入手。

第一章 记体散文的文体独立

“记”原为应用性的记事之文，如《文心雕龙·书记》所说：“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①这是指王公的奏书和公府的奏记而言，属公文的不同格式，并不具备后世所称记体散文的文体意义。作为短篇散文的记体散文，是在唐代韩愈、柳宗元开创的“古文”新体的基础上形成的，或借以议论时事，或抒发个人感慨，突破了简单的“叙事识物”的记事范围，而成为有文学性的短篇成体散文。记体散文形成于唐，盛于宋，南宋进入稳定的发展阶段，其文体的独立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融记事与议论、抒情为一体的“记”之文体的定型；二是单行奇句而兼取骈语的散文语体的发展成熟。

第一节 记体的传承与发展

记体于唐代始进入古代散文文体序列，宋人在不断开拓新的写作样式的同时，开始积极探讨记体散文的源流正变、体制规范。北宋陈师道梳理记体创作，辨正有云：“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②南宋真德秀将志、记的文体渊源追溯至《禹贡》《武成》《金縢》《顾命》，从体制源流上说明记体为叙事之文，源于古史官。明代徐师曾和吴讷延续成说，陈懋仁注《文章缘起》时说：“记，所以叙事识物，非尚议论。……文以叙事为主，后人不知其体，顾以议论杂之。”^③可以看出，这些在文体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在辨章体制时，无不反复申说“叙事”乃记文正体，以纠正宋以来记体散文创作中出现的以“论”为记的偏向。“叙事”抑或“议论”？要确定记体散文的文体规范，我们首先应对“记”之文体的源流变迁作一梳理。

① （南朝）刘勰撰，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4页。

② （宋）陈师道：《后山集》卷二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梁）任昉撰，（明）陈懋仁注，（清）方熊补注：《文章缘起》，《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0页。

一 “记”名之源流及内涵

“记”之为名,从其最初的使用看,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记”进入文体之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由泛指到专名,由经入史,但其中“记”乃纪事载录之义贯彻始终。

元郝经在《郝氏续后汉书》中有云:

记,凡志之典籍者皆是也。故《易》记理之书也,《书》记辞之书也,《诗》记声之书也,《春秋》记事之书也,四经万世之大记也,而不以记为名。孔子没,诸弟子及秦汉诸儒各为记录,如《礼记》《乐记》《杂记》《学记》《表記》《坊记》《秦记》《史记》,皆记注于四经之后,而以为名,然未特命篇为文也。^①

郝经认为从文字记录、记载的角度来说,凡书籍皆为记。《礼记》《乐记》《学记》《表記》等始以记名篇,大都属孔门后学对经书的注解。从《汉书·艺文志》所列书目也可看出,六略中独“六艺略”有以记名篇者九部。^②此时记已发展为专名,指称经学中的记注之文。《四六丛话·记十三》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记者,文笔之统宗,经子之径术。”又有:“夫浑噩焕郁,史包四代之文;征范贡歌,书标七观之美。体则角立,记乃无闻。”^③在先秦典籍所囊括的文体中,记并不具列其中,实属“经子之径术”。

这些注家之记与后世的单篇记体散文并不一致,但从划界限的角度来说,这时的记已初具区别性的文体的意味。后人从经书注释的体例或内容出发,认为传、记同义,皮锡瑞曰:“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④但从发生学的角度,传、记实属不同统绪。战国秦汉时,治经学各成专家,如《书》有伏胜,《诗》有申培公、辕固生、韩太傅,各依经立义,传之于后。而记则多为后世学者各记所闻而成,典型代表是《礼记》。颜师古曰:“《礼》者,《礼经》也。《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也。”^⑤细查《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诸篇,或记孔子、曾子、子思等先贤有关礼仪制度的言论,如《哀公

① (元)郝经:《郝氏续后汉书》,《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66—777页。

② 《书》类有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许商《五行传记》一篇,《诗》类有《齐杂记》十八卷,《礼》类有《记》百三十一篇,乐类有《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春秋》类有《公羊杂记》八十三篇、《公羊颜氏记》十一篇、《汉著记》百九十卷。

③ (清)孙梅编:《四六丛话》,《万有文库》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71页。

④ (清)皮锡瑞著:《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9页。

⑤ (汉)班固著:《汉书》卷五十三“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0页。

问》《坊记》《表記》等；或记录先秦仪礼制度，如《曲礼》《少仪》《奔丧》等；或解经之义，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等。孔颖达云：“至孔子没后，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①我们虽不能确定《礼记》诸篇作者，但将记与传、说相比，传为专家传经所作，附经而行；记为各记所闻，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郭英德在《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一文中揭示文体的生成，是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变迁的过程。传与记行为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在解经传统中，记与传、说等已形成类的差异，记的核心内涵为记载，并直接影响后世的记体散文的文体意识。

两汉魏晋以后，史类记文蓬勃发展。《隋书·经籍志》中经部收录二十三部，史部一百六十三部，子部二十六部。史部最多，其中又以杂传和地理记为主，杂传三十二部，地理记八十部。^②史部以记名篇的比例增多，正可看出此时史学的兴盛，突破经学的桎梏，恢复史学纪事的本意，并直接影响了后世的纪事文章。

《四六丛话》中总结记之源流时有云：“《阳羨风土》，堪列《职方》；《荆楚岁时》，宜增《月令》。《默记》征一代之传，《郑记》守一师之说。提铅握槊，同衮钺于《春秋》；书笏珥彤，摄言动于左右。盖自汉以上，抽圣人之绪，而半入于经；自汉以下，成一家之言，而兼通夫史。”^③可谓的论。在经学范畴中，以记为名的记注之文已初显。“记”之内在规定性为载录纪事，史述志记直接影响后来记体文的文体意识及文章内容。从这个角度说，后人将记之名追溯至《学记》《礼记》，将记之祖溯源于《尚书》中记山川土物的《禹贡》，及纪事的《顾命》，是有坚实根据的。

唐以前，“记”之名已著，但“记”之体尚未出现。这时的“记”还不是文体的概念，因尚未非“特命篇为文”，这里的“篇”当为篇什之体。“文体”的生成首先与篇章的出现相伴随。“文体”之“文”，首先应为篇什之文。

今人在探讨“文”这一概念时，常或隐或显地秉持着一个标准，即以现代所谓“文学”的含义来衡量“文章”概念的发展过程，并以此来观照萧统的《文选》，认为其中体现出的“文”的概念与现代的文学观念接轨。这一结论却很难解释《文选》中收录的诏、册、令、教、文、表等今天看来与“文学”相去甚远的文体。

①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② 以“纪”为名的著述也统计在内。刘熙《释名·释典艺》中以“纪”释“记”，又“记”释“纪”，二者同义。

③ 《四六丛话》，第371页。

倘若暂时悬置有无“文学性”的问题,将文章概念缩小为“文体”之文,它的准确含义应是篇什之文,排除了著述之体,区别于之前广义的文章概念。萧统《文选序》云: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①

其中先后提到“篇章”“篇翰”“篇什”,分别对应着子、史、赞论序述,其中子、史都因“事异篇章”,“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被排除出去。所谓“篇章”“篇翰”“篇什”,当为异于著述的单篇之文。后人分析《文选》的选文思想,通常将录与不录的界限认定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而忽略其中提到的篇章的概念。我们认为“篇什之体”才是萧统收录文章的首要标准,所谓“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是出于尊经的一种说法,探其内里,也当是因为经的体式首尾相连,异于“篇什之体”。而史中赞论序述能被编入集中,除“综缉辞采”,“错比文华”,更因其单篇成文,能“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柳宗元曾把“文”分为“本乎著述”与“本乎比兴”两大类,即高壮广厚的著述体与言畅意美的比兴体。^② 近人章太炎在《文学略说》中,则将文章分为“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他说:“著作之文云者,一书首尾各篇互有关系者也;独行之文云者,一书每篇各自独立,不生关系者也。准是论文,则《周易》《春秋》《周官》《仪礼》、诸子,著作之文也(《仪礼》虽分十七篇而互有关系);《诗》《书》,独行之文也。”^③这就可以解释萧统选文时有诗、诏、檄、笺、疏、状、志之

① 高步瀛著,曹道衡、沈玉成点校:《文选李注义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30页。

② (唐)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78页。

③ 章太炎著,傅杰校订:《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类,却不录经、子、史的文章。明徐师曾也说:“夫文章之体,起于《诗》《书》。”^①袁宗道更详细地解说道:“吾置庖羲以前弗论,论章章较著者,则莫如《诗》《书》。乃骚、赋、乐府、古歌行、近体之类,则源于《诗》;诏、檄、笺、疏、状、志之类,则源于《书》。源于《诗》者,不得类《书》;源于《书》者,不得类《诗》。”^②从这点也可看出,古代文体确立的首持标准即为篇什之体的独立。

因文体之文首先为篇什之文,唐前的记文尚为经、史之著述,独行之文,因而虽以“记”命名,却不能称之为“体”。记体于唐代始进入文苑,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永清县志文征序例·征实叙录》中论传记之源流时说:

古者史法谨严,记述之体,各有专家。是以魏晋以还,文人率有别集。然而诸史列传,载其生平著述,止云诗赋箴铭颂诔之属,共若干篇而已。未闻载其记若干首,传若干章,志若干条,述若干种者也。由是观之,则记传志述之体,古人各为专门之书,初无散著文集之内,概可知矣。唐宋以还,文集之风日炽,而专门之学杳然。于是一集之中,诗赋与经解并存,论说与记述同载,而裒然成集之书,始难定其家学之所在矣。若夫选辑之书,则萧统《文选》不载传记,《文苑》《文鉴》始渐加详,盖其时势然也。文人之集,可征史裁,由于学不专家,事多旁出,岂不洵欤?^③

章氏认为传记本为专门之学,唐宋以来,才成为文集集中的单篇之文,《文苑英华》《宋文鉴》将其收录归纳为一体。

二 “记”体之渊源及类别

“记”之为体,是从著述逐渐衍生出的篇章,“记”之为名,也经历了从广义到狭义的过程。因其“记事”的文体意识,后人在考辨文体源流时,多溯源于古代史述。综合记体包括的所有文类,我们认为,记体的发展源头除史述之外,还包括地志、碑文与题名题记。

(一) 记与史述

后人在研究“记”之文体时,尝上溯到史述。目前所见首次对“记”的文体

① (明)吴讷,(明)徐师曾著:《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合印版,第77页。

② (明)袁宗道著,钱伯城标点:《白苏斋类集》卷七《刻文章辨体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③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六《永清县志文征序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90页。